

松潘地区的多宗教共存现象研究

潘显一 汪志斌 唐思远

【摘要】松潘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区域。这个地区，以汉藏羌回四个民族为主要人口，集中了中国宗教的几乎所有形态，这些宗教形态不仅共处一地，甚至同居一庙，并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盛大宗教活动——黄龙庙会，诞生了融合各民族宗教信仰的“黄龙真人”形象。这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多宗教共存、对话与社会稳定的问题，以及筹划这一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建设与管理等，都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广泛的借鉴。

【关键词】松潘；多宗教共存；宗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 (2009) 03—041—03

松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北部，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区域。在它的南面是茂汶羌族文化区，东边与汉民族区域连接（平武），往北有甘肃、宁夏的回族文化区，往西、西北以及西南则是安多、嘉绒藏区。松潘就正是处在汉藏羌回这四个民族的主体文化区域的交汇点上，并成为由汉藏羌回为主要人口的多民族杂居区域。^①多民族的杂居带来多宗教的共存，在松潘地区，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本教、回教（伊斯兰教）以及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都在这里交错分布，20世纪前期基督教也曾经在这里短暂驻留，这些共同构成了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文化生态结构。本文是在广泛的文献考据和直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

一、松潘地区的多民族多宗教共存格局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

松潘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人文积淀。早在远古时期，松潘就有人类居住，秦惠文王时设湔氐县，西汉元鼎年间设湔氐道，晋设升迁县，唐称松州，明洪武年间合松州、潘州为松潘，并延续至今，因而，松潘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悠长岁月的历史名城，洪武年间修建的松潘古城至今仍有

部分残留，算起来也有近700年历史了。在松潘的岁月长河里，首先出现在这里的居民的情况，已经难以考证。秦汉以来，古代史书通常将这一带居民称为“戎”“夷”“氐”或“羌”，《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有“六夷七羌九氐”的说法，已经透露出此地族群的多样性，《华阳国志》用“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来描述汶山郡（晋汶山郡下辖升迁县）的土著居民状况，所显现的也是这种族群多样性。公元6世纪以后，这种“杂乱”的多样性开始减弱，大唐与吐蕃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使得这里的居民或者汉化，或者吐蕃化，或者继续保有其文化传统。这些保留其文化传统的土著居民也开始获得统一的称呼“羌”，于是有“西山诸羌”“西山八国”等说法，松州、茂州在当时也被称为“羌州”。9世纪以后，吐蕃王朝解体，而吐蕃和吐蕃化的民众则以语言、宗教（藏传佛教、本教）为纽带向着一个有着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习俗的族群演变，元代将岷江上游划归宣政院管辖，则强化了这种演变，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藏族分支——安多藏族。这种“羌在汉藏之间”的历史格局至今仍然能够在四川西北部的民族分布中清楚地看到，而在松潘本地的民族分布中，则展现为“汉回在羌藏之间”的格局。在今天松潘地区的民族分布地

^①建国以前，松潘所管辖的范围涵盖了今天阿坝州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远至青海东南部，那时的松潘，少数民族占据绝对的优势，民国时期的调查就说“番民”占松潘人口的十之七八，今天的松潘则是古代松潘的核心区域，汉藏人口占主体，基本相当。据《松潘县志》(1999年)的数据，1990年，松潘总人口为64641人，其中藏族24038人，羌族4543人，回族8398人，汉族27633人。

[收稿日期] 2009—03—06

[作者简介] 潘显一，教授，四川大学“985”宗教与社会研究社科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
汪志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四川成都 610064
唐思远，黄龙景区管理局局长。 四川松潘 623300

图上，我们大致可以划分出三个部分：西、北部藏区、东南部羌区和居于二者之间以汉回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域。这个分布格局是随着回族在明代的最后出现而形成的。回族虽是到明代才形成，但作为回族前身的“西来”伊斯兰信徒则早在唐代就已经涉足松潘地区，元蒙以松潘为据点进攻四川，也带来大量西域伊斯兰信徒，其中部分就落足松潘，形成后来的松潘回民。因此，当明洪武十二年丁玉平定松潘确立汉文化在这片区域的主导地位的时候，汉藏羌回的基本格局就已经具备雏形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松潘地区以汉藏羌回为主体、汉回在羌藏之间的多民族共处格局，并以这种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结构同周边文化区域明显地区分开来。松潘地区的多宗教共存现象则是这种多民族共处格局在宗教文化领域的一种展现。

二、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一个首要特点就是宗教形态的多样

在这一地区，几乎中国宗教的所有型态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大致来说，松潘地区的宗教形态中，回族的宗教信仰最为整齐，都信奉伊斯兰教。凡是一定规模的回民聚居区，往往就会有清真寺，大者屋宇连栋，小者一殿即可，早的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晚的则只有几十年。其次则是羌族的自然宗教信仰，崇拜白石，举行祭山会，奉祀山神以及其他具有地方保护神色彩的各种神灵，并因不同的村寨而有具体差异，这种差异之一就是由其所处地的民族交往的不同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汉化或者藏化。

汉藏两族的宗教形态则更加多样。松潘藏族的宗教形态中，本教是最为主要的形态，本教寺庙遍布藏区，甚至某些地方还有相当原始的本教活动。在县城以北的漳腊地区，沿岷江两岸，错落分布有噶米寺、小西天噶米寺、扎雍忠寺（尼姑庙）、对河寺、山巴寺、元坝寺、林坡寺等众多本教庙宇，形成了一个相当集中的本教庙宇群，也成为松潘地区藏族宗教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藏传佛教的其他派别，格鲁派、萨迦派、宁玛派也都在此地有着传播，这些教派及其寺庙主要分布于岷江河谷的多民族杂居区域，如属萨迦派的大寨乡上泥巴寺（水草坝），属宁玛派的安宏乡烟囱寺，属格鲁派的位于牟尼沟的后寺、肖包寺，其中格鲁派是此地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强的，并呈现出向本教区域渗透的态势，位于毛尔盖上八寨索花村的毛尔盖寺为松潘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就位于藏族集中聚居区。

至于松潘汉族，虽然不像松潘其他三个主要民族那样全民信教，但其宗教崇拜风气依然是浓厚的。至今松潘汉族人口不过三万上下，而民国《松潘县志》所记载的汉族寺庙（不含南坪，今九寨沟县）就有 115 座，而这还不是松潘汉族庙宇的全部。这其中，既有进入祀典的国家宗教祭祀场所，如文庙、武庙、龙王庙、坛等，也有佛道二教寺庙，如大悲寺、赤松观、玉虚观、真武庙等，还有具

有民间崇拜特色的地方小庙，如牛王庙、马王庙、药王庙、娘娘庙、黑虎庙等。在我们对松潘的宗教考察中还发现一些明清以来的民间教门经卷至今依然在当地汉族中流传，如大乘天圆顿教的《龙华宝经》《龙华宝忏》以及可能属于黄天道或者长生教的《金刚宝忏》等。而且，松潘漳腊观音山崇善阁还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诞生过一套具有浓厚本地色彩的救世劝善文书《醒迷太平新经》，至今当地民众仍有人在诵念。

此外，在晚清、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也曾经踏足这片区域。据民国《松潘县志》记载，晚清咸丰同治年间，松潘县城建有“圣修堂”，光绪年间又建有“福音堂”。民国初年，美国传教士达尔克曾在松潘传教，直到 1937 年。

三、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些宗教形态之间的和谐共处

诚然，在松潘的历史上并不缺少宗教之间特别是教派之间的信仰争夺，但总的来说，和谐共处是这片区域宗教形态之间的基本态势。这种和谐共处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在整个区域层面上多宗教共存和多民族共处的一致性；其次则是在一定的狭小范围内的多宗教共存，如松潘县城道教、佛教（汉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处，又如牟尼沟伊斯兰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庙宇的共处；再次则是在更小的范围内，即一庙之内的多宗教共存。这种多宗教共处一庙的情形，既包括同一民族内不同宗教形态之间的，如黄龙寺的佛道共存，也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共存，如松潘岷江乡的龙安堂。

龙安堂，位于松潘县城东南方向 40 公里的岷江乡岷江村，坐落于岷江乡至大姓乡约 1.5 公里的石龙山（属岷山山脉）脚，纳咪河自北而南由岷山主峰雪宝顶向下流经庙前汇入岷江，海拔 2700 米。当地人又称“多嘛哩”，此名大约来自该寺旁侧一块直径 2 米左右的大石上天然显示的白色花纹，该花纹神似六字真言之俗写“嘛哩”二字，当地传说这块大石由西藏飞来，故被尊为神石。据《圣地龙安堂寺简志》称：素有“龙安堂”之称的这块圣地，多有天然珍宝和天然藏文字符。并将龙安堂与胜乐殊圣地黄龙山泉“瑟措”和九寨沟“普措”通称为三大名胜。当地文人也有“黄龙通四海，鱼出龙安跃九州”的描述。从有关龙安堂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这里至迟在唐代就已经是一处宗教圣地了。据说，8 世纪时，藏传佛教前弘期三大译师之一的毗卢遮那（又译作白若杂纳或者白诺扎拉）因受排挤而到藏东传教，曾驻足于此，并祭山布法，开启山门。此后，元代萨迦派活佛葛阿念丹巴、乾隆时期的嘉木样二世活佛等众多显密二乘上师和本教活佛都曾在此驻歇、传法。嘉庆十二年（1807 年），松潘平番营守备何玉超在此建有神庙，参与建庙的包括汉藏羌各族民众，民国县志记载此庙为“观音堂”。此后该庙屡毁屡建，直至今天依然是一处汉

藏羌多民族共同尊奉的宗教圣地。

今日的龙安堂，是一个不大而狭长的进行了藏文化装饰的汉族四合院，寺庙周围空地上散布着许多白石堆、玛尼堆以及彩旗、经幡，山崖间还有喇嘛的修行屋。寺庙山门装饰有法轮、神鹿等藏传佛教的传统符号，应当是近10年来的结果。大门上有一类似麒麟的彩绘神兽（疑即是《封神演义》中所说的慈航真人坐骑金毛犼，也是此庙作为观音堂的一个标志），颜色已经相当黯淡。房屋也非常陈旧，似乎至少有百年历史。院内天井长约18米，宽6米，地面铺有石板，但早已磨损不堪。看着那仿佛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模样，很难不把龙安堂的历史往久远里看。也许，这块地基上的房屋已经轮换了许多次，但这片地方却是一直承载着人们朝拜、进香的脚步。拾级进到正殿，迎面是一高耸的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千手观音画像，空间相当逼窄，但转过这由一块支撑起来的大木板所悬挂的神像，我们才看到大殿原本的神位。中间正中的是观音，左右陪塑的是文殊和普贤；左边正中是药王，骑虎抚龙；右边是三女神，正中女神抱一娃娃，观其陈设，当具有“送子娘娘”的功能。这大约就是龙安堂作为“观音堂”的原本神像格局，观其状况，并不很新，至迟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重塑，而藏传佛教的神像则集中供奉在山门楼上，除了佛教尊神外，尚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塑像。现在主持改寺庙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僧人，每到宗教活动的日子，各族民众依旧会聚于此，依照各自的宗教习俗展开宗教活动。

四、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多民族宗教共存中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生成

这种渗透既表现在同一民族内宗教形态之间，如汉族佛道之间的渗透，藏族本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渗透影响，也表现在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之间，如松潘伊斯兰教就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松潘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处融合的最突出成果就是“黄龙真人”这一崇拜对象的生成。

黄龙真人是黄龙寺的奉祀主神，也是黄龙沟寺庙建筑群的核心，通常被看作是一尊地方道教神，而究其渊源，则是松潘汉藏羌等多民族宗教信仰与崇拜活动在千百年共处一地的融合中生成的一个多元层叠形象，这一形象虽然借用了“黄龙真人”这一具有道教色彩的名号，其实质内涵则主要是松潘本地民众宗教信仰需求的会聚。

松潘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角，岷山山脉中断，是岷江与

涪江的发源地，高寒荒漠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的生存与生活极其艰难，农业每年只能有一季收成，而且对天气变化极端依赖，冰雹、水旱常有，粮食往往难以自给。明代嘉靖年间，紧邻松潘的龙州（今平武）宣抚薛兆乾作乱，阻断了松潘东路的交通，结果，不过十余日，“松州米贵如金”^[2]。这种生存的艰难是松潘所有民族共同的处境，它不仅是生活于松潘的各族民众宗教崇拜的真正生成根源，也是各民族宗教渗透与融合的真正契机。宗教总是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松潘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十二至十五的黄龙庙会就正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

据民国《松潘县志》记载：

松潘附近地产每年仅收一季。立秋前后十馀日、禾稼将熟未熟之时，白昼则虑大雨寒凝冰雹，夜晚则虑天晴露积为霜。禾苗受冰雹则籽散满地而包谷亦空，经霜则籽尽枯槁而生机立绝。此二者实农民之大害也。

立秋在每年的8月7日或者8日，正是农历的六月。此时农事已经结束，“禾稼将熟未熟”，既是农业丰歉的关键时期，在古代没有足够的农业科学技术而不得不靠天吃饭的情况下，也是农民只能无奈地等待时期，同时又是一年中松潘天气最适合外出的时期。于是，在有限的经验措施之外，“请番僧念经”以及向神灵祈祷，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萌生于共同生存处境从而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崇拜取向所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可以寄托或者承载当地民众精神需要的空间，而岷山的主峰雪宝顶以及位于雪宝顶北侧流淌着神奇的露天钙化彩池与钙华滩流的黄龙沟正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于是，从很早开始，对山（神山—山神）的崇拜，对水（圣水、雨师等）的崇拜，对龙神（主风雨）的崇拜，对各民族英雄人物的崇拜与怀念，以及各类教派祈祷、护佑的宗教仪式与宗教修行活动，……，都在每年农历六月的宗教需求中逐渐向着雪宝顶以及黄龙沟会聚，使得这里在很早就成为一处各民族共同尊奉的宗教圣地，成为松潘各族民众共同朝圣祈祷的道场。

因此，在明代中叶黄龙寺修建从而确立“黄龙真人”的形象与中心地位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层叠融合的形象，是一个当地汉藏羌等民族共同奉祀的崇拜对象，尽管不同的民族其崇拜方式有别，而其内在实质与精神却是一致的，都是对美好生活与幸福人生的企望。

松潘地区的这种多宗教和谐共处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多宗教共存现象的典范，它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多宗教共存、对话与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筹划这一地区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建设与管理等，都提供了积极的参考和广泛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M]. 中华书局, 2008.
- [2] 参见大明一统名胜志·四川名胜志：卷二十六 [M].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